

## 主持人语

---

钱林森

《跨文化对话》第33辑组织了侨易学观念圆桌笔谈，就叶隽君提出的侨易学理论，邀请各领域各学科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多方位、多面向、多层次的讨论，不仅充分肯定侨易学的中国理论自觉，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可以展开的前沿问题、可以开辟的知识领域、可以联通的学术空间。我们也提出本刊乐意提供平台，首辟圆桌笔谈，旨在期待学界更多的朋友积极参与，以进一步完善侨易学这一跨文化研究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宏大建构。经过充分的酝酿，本刊继续推出第二组圆桌笔谈，邀请相关领域的学者围绕侨易学观念来探析侨易学的学理空间、学术意义和存在问题。

崔唯航先生探讨了侨易学的创建对中国学术发展的意义。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对我国百余年来学术发展影响至深，一方面使中国学术更为便利地吸取异域文化的营养；另一方面却也使中国学术逐渐丧失了其主体地位，跟在西方学术后面亦步亦趋而不能自拔。侨易学的努力方向则既不是以中济西，也不是以西济中，而是建立在对这二者的超越之上，从根本上跳出这种困扰中国学术百年之久的思维框架。同时，侨易学又能超越现代学科建制和视角的拘囿，探寻充斥于自然、文明乃至宇宙之中的大道，体现了一种原创性的整体性思维。尤为可贵的是，侨易学在寻道途中自觉坚守了中国学术的民族本位，对中国学术的未来走势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张华先生通过侨易学视角和方法，研究世界文学的格局，并称之为世界文学的侨易格局。这就表示要把文学看作一种阅读方式，即在相互关联性中阅读文本集合的方式，并且以此为起点，去探讨世界文学的相互关系。文学的侨易，不仅影响文学语言的选择，也与地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以及科技即侨易的环境相关联。为什么存在于同样环境中的文学，却有不一样的历史？侨易学为解决这样的问题提供了

潜在的可能性和研究模式，也为探讨形成世界文学格局的六种类型提供了方法。这六种类型分别是：一是非常狭小区域内的文学（Very Local），或当地文学，包括古典的和现代的，如部落文学；二是狭小行政区域内的文学（Translocal），主要是古典的，因为政治和行政区域的设置而跨域了非常狭小的区域，如古希腊文学、玛雅城邦文学；三是四海为家之文学（Cosmopolitan）；四是当地文学，区域文学，或方言文学（Vernacular）；五是民族文学（National）；六是全球文学（Global）

赵晨先生认为，侨易学中的易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处理问题之道，侨则涉及国际关系交往，因而能给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研究带来新视角，给理性国际关系理论增加了交往移情的动力，以及利益驱动和无我逍遥之间的中观层次。在政治学体系中，侨易学应该归属政治心理学范畴；在国际关系理论里，它与建构主义最为接近。它既有传统中国思想的影子，强调势与度，决策者应当顺时、顺势、顺力而动，在不同情境下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政策；又符合全球化时代人与人、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交往频度和密度大为增加的时代背景，集中关注这种接触、交流、交易所带来的决策者的心理和思想变动，故可以说兼具世界性和中国特色于一身。侨易学是在文学和学术交流史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在用来研究国际政治时，更擅长从微观个体而非宏观架构入手，推演由侨致易的进程，其逻辑是政治进程中的人的思维的改变将影响组织、国家，乃至国际政治的决策结果，而决策者思维的改变是通过物质位移或精神位移，与他人交往中实现的。

韩水法先生认为侨易学提出了新的概念和观念，有助拓展研究的路径和空间，体现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原创性，但同时，用自创的概念解释不同人类观念和思想之间的交通及变易，难度也是不言自明，要看这些概念能否引出新层面和新知识，能否确切地界定、合理地 and 内在一致地使用。侨易学尝试解释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人与观念并重的交通与变易结构，是一种方式和视野上的努力，具有强烈的提供概念框架和范式的意图。这种宏大的构建最容易受到实证研究的挑战。倘若过于抽象和思辨，就无法适应当今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越来越注重实证的研究形势；倘若过于一般，就难以切合历史上千差万别的文明形态和亚形态，面对各种殊异的事实就会如雪泥鸿爪。因此，侨易学究竟是一种以原理为主的体系，还是以方法为主的理论，还很值得反思。

陈涛先生便借助侨易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近代在华的传教士。中国融入世界整体的进程始于近代，对于中国而言，文化的全球化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近代开始的東西文化交流，从相互不理解到冲突碰撞，再到相互了解甚至是模仿学习，并在这种

向对方学习的过程中又加深对自身的认知。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微妙的过程。在用文化交流学视角进行研究时，仅用交流这个词，很难具体地描述这种相互关系，而侨易学则提供了一个更为深入的视角，因为其核心就是交易层面，也即侨易主体通过相交而发生的精神层面的质性变异。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核心，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所提出的陌生人便体现了侨易过程。首先，他们经历了物质位移，通常身处一种异质文化之中；其次，他们所引发的陌生人恐惧症以及他们化解自身困境最终形成较为顺畅的文化交流的过程，就是两种文化互动博弈最后导致新思想出现的过程，也正是精神质变的发生。作为陌生人的来华传教士达到了交易的目的，即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部分中国人的思想传统，但也保存了不易和恒常。尼采在《查拉斯图如是说》中曾提出过著名的精神的三种变形：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子，最后狮子如何变成小孩。这恰恰与侨易学中的精神质变形成了一种呼应。具体到近代东西文化交流，传统的东方思想正是骆驼，当受到传教士们所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冲击时，骆驼变成了狮子，最终，东方传统文化在经历了种种曲折起伏之后，得以变成小孩，重新获得新生。

顾钧先生从三个方面补充了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一书中对侨易现象的界定和分析。（一）侨易现象虽然集中在近现代，但古代也有。虽然古代侨的几率和范围自然要小得多，大多数士人的足迹不出于禹域之内，但禹域内的游历也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精神面貌。由于战乱、朝代更迭造成的侨则更容易给人带来质变。而且，一个人即使不发生空间移动，同样会有精神的变化，因为人不仅生活在空间中，也生活在时间中，时间流逝给人带来的变化有时甚至超过空间的变化。（二）有群体侨易，也有个体侨易，个体有脱离群体的情况；同时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因为侨居地的不同，其精神变化也是不同甚至截然不同的。例如，犹太人命运多舛，流散四方，但其民族性并没有消失，在经历了近两千年的流亡后，不但没有销声匿迹，被异族同化，反而于1948年复国。这一奇迹对侨易学的意义在于，一个发生了巨大空间位移的民族，却没有发生精神位移，是否说明侨与易之间并不是一种正比例关系？当然，犹太民族作为一个族群确实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性，但不是每个个体都能做到这一点。北宋中叶来到开封的犹太人就逐渐被中国文化所同化。因此，侨易学应该给予群体侨易和个体侨易以同样的关注，特别是那些游离于群体的个体的侨易。（三）就个体侨易来说，有因侨致易的情况，但也有不易的成分；同样，就群体来说，也有因侨致易和不易情况。例如，在近代中国的学术繁荣期，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等新式人物都只是部分的“新”，不少旧的东西依然留存在血液中，在因侨致易之外还有不易的东西在，

也即存在着易与不易的杂糅。总之，侨与易之间的关系是颇为复杂的，古代、近代、群体、个体以及个体内部都存在各种各样的侨易关系，值得做更为深入的探讨。广义的侨易学应该具有更广阔视野，凡是与侨易有关的现象都可以纳入考察的范围。

本辑侨易学笔谈，得益于叶隽及其侨易观念工作坊同仁乔修峰先生的鼎力相助，得益于上述诸位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和贡献，在此一并感谢。叶隽君在国内外广召队伍，聚四海贤士，已在京城推出了《侨易》学术期刊创刊号；而在外省，在叶先生故乡江苏省，羊年开泰之际，叶隽亲自主持的《江苏师范大学学报》“人文世界与侨易空间”栏目，业已问世近一年，顿然间，在“吾国吾乡”，已蔚然大观，真可庆可贺！

2015年2月12日，初拟，2015年5月23日凌晨改定  
南京秦淮河西滨跬步斋陋室